



学者指出，因为政治的原因，欧洲安全机构正在致力于将伊斯兰的危险最大化，好像它就是整个欧洲面临的巨大挑战。

“伊斯兰恐惧症”与“欧拉伯”未来想象

□ 林丰民

前不久挪威发生的血案，引起了欧美和伊斯兰世界对欧洲“伊斯兰恐惧症”的热议。“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一词，表达的是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一种态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敌视的态度。新近发生的挪威血案就是这种敌视态度的一个极端表现。

“伊斯兰恐惧症”在欧洲不仅是一种思想的呈现，更有着许多具体的实例可以证明。我们从近到远推开去，可以发现有很多典型性事件充分表明欧洲真的患有“伊斯兰恐惧症”。

禁戴面纱与呼吁监视

今年4月11日，法国正式开始实施一项新的针对穆斯林的法律，即禁止妇女在街道、车站、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戴面纱，任何人违反禁令都要受到150欧元的罚款，或参加民事权利培训。该项法律还规定，对迫使或诱使妇女戴面纱者将处以更为严厉的惩罚，情节严重的可被判处一年监禁和罚款三万欧元；而迫使未成年女子戴面纱，则将被判处两年监禁和罚款六万欧元。支持该项法令的法国人认为，妇女戴面纱是伊斯兰教的狂热表现，它压制了妇女的权利，因此上述法律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妇女特别是穆斯林妇女的权利。

以开放著称的法国在欧洲率先以立法方式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颇具象征意义。在法国，人

们随便穿着，即使任意裸露也无人干涉。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度，却“依法”禁止穆斯林妇女将自己的脸遮掩起来，很难否认这不是“伊斯兰恐惧症”的症状。目前，在法国约有500万穆斯林，而一直戴面纱的妇女大概只有一两千人。对这一小部分人戴面纱的行为加以严格的限制，让人感觉简直是小题大做。这项法律去年10月11日就已经在议会获得通过，当时只有一个人反对，而其他议员全部投了赞成票。

其实，早在2004年，法国就通过了相关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内佩戴有宗教色彩的饰物，包括带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头巾。如果有戴头巾的妇女去政府部门办事，那么政府职员未等对方开口就会提醒她：“请你摘掉你的头巾，因为我们是在法国。”随后不断发生学生或教师因戴这类头巾而被拒绝进入校园的事件，一度引起法国国内的猛烈批评和抗议。而如今，这一禁令的实施范围已经由学校扩展到所有的公共场所。

法国的这种做法对其他欧洲国家有着示范带动效应，德国、荷兰、瑞士等国也都发生了有关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或禁止修建清真寺的激烈争论。德国内务部长曾呼吁对新皈依伊斯兰教的德国人进行监视。一位法国学者指出，因为政治的原因，欧洲安全机构正在致力于将伊斯兰的危险最大化，好像它就是整个欧洲面临的巨大挑战。

他还认为，许多提上欧洲政治议事日程的事，都是安全机构在幕后操作。

尖塔禁令与教皇言论

2009年11月29日，一向对待伊斯兰教比较温和的瑞士政府组织了一次公投，结果通过了一项法令——“伊斯兰尖塔禁令”，即禁止在瑞士境内建设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尖塔。所谓“尖塔”，是清真寺的标志性建筑，正确的名称是“宣礼塔”，每天临近做礼拜的时间，宣礼员便会爬到宣礼塔上召唤周围的穆斯林来清真寺做礼拜。领导“反尖塔运动”的瑞士人民党认为，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尖塔象征着渴望获得建立伊斯兰教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权力，而这违反了瑞士宪章的自由权内容。尽管在瑞士只有四座清真寺带有宣礼塔，但是这已经让瑞士一些人对穆斯林感到担心，因为在瑞士的穆斯林已经达到40万。

2007年9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前夕，法国的一些极右分子在街头散发传单，在招贴画和标语牌上面写道：“我爱自由，反对伊斯兰。”据报道，当时还有两万名极右分子打算在斋月的前一天从欧洲各国前往比利时欧盟总部前集会，并要高举“让我们抵制欧洲伊斯兰化”的标语，发起一场反对伊斯兰教的运动。

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梵蒂冈教皇不当言论的影响。2006年

9月,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访问德国时发表演讲,引用了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的话:“给我看看穆罕默德有些什么新东西,你只看到了邪恶与非人道的东西,比如他要求用剑去传播他的教义。”随后,教皇又阐释说,暴力“不符合上帝的本质,也不符合灵魂的本质”。他的发言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同时也鼓励了欧洲那些反对伊斯兰教的极右翼分子。

人们还记得2005年~2006年发生在丹麦的漫画事件。一系列丑化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形象、妖魔化伊斯兰教的漫画作品,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多幅漫画将穆罕默德和穆斯林描绘成凶神恶煞,不是手持阿拉伯弯刀就是怀揣着

炸弹。其中有一幅是一名漫画家的自画像,画中的他在画着穆罕默德的形象时,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背后,唯恐遭到穆斯林的攻击,其恐惧情结可见一斑。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欧洲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恐惧症有几种原因:

一是文化差异。毕竟欧洲的文化是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基础的,而穆斯林的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价值观、道德体系和思维模式的不同方面,也表现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容易让欧洲人产生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斥感。

二是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很难被欧洲同化,或者说是移民到欧洲各国的穆斯林很难融入也不太愿意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穆斯林有着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这使得他们极力保持着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氛围,特别是穆斯林在欧洲的聚居为这种文化习性的保持提供了便利条件。有些欧洲人提出来可以通过通婚的行为来同化穆斯林,但是事与愿违,通婚的结果是,凡要和穆斯林结婚的欧洲人,无论男女最后都加入了伊斯兰教,而不是相反。欧洲人不仅没能同化穆斯林,反而是被穆斯林同化了,这也让欧洲人产生了一种隐隐的不安。

三是穆斯林人口剧增。这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北非等地的穆斯林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欧洲;一部分是尽管目前数字不大、但发展非常迅速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本地人;第三部分是第二代穆斯林移民和移民后裔,这部分人口的增长更加令欧洲人感到恐惧,因为欧洲人的思想观念使年轻一代不愿意生孩子或者不愿意多生孩子,有些欧洲国家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而移民欧洲的阿拉伯人仍然秉持固有的观念,对生育基本不加节制,这导致欧洲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假以时日,穆斯林人口就很可能超过本土欧洲人。

德国某研究所2007年曾经对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做过一个测算:当年欧洲(包括俄罗斯及东欧)的穆斯林人口约为5300万,其中在欧盟有1600万。根据另外的数字,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500万至600万,这意味着已经占到法国全国人口的10%。在这一人口基础上,穆斯林的高生育率与欧洲本地人的低生育率,将使双方人口比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欧洲一些大城市,穆斯林人口所占的高比例更是令欧洲人忧心忡忡,如鹿特丹为25%,阿姆斯特丹为24%,马赛为20%,布鲁塞尔为17%,布拉福德为16%,巴黎、伦敦和哥本哈根均为10%。



>>> 穆斯林有着强烈的宗教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这使得他们极力保持着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氛围,特别是穆斯林在欧洲的聚居为这种文化习性的保持提供了便利条件。

欧拉伯：“阿拉伯的欧洲”

2008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任负责人伊夫雷姆·海勒威，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做了题为《站在2009的前夕，世界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发言，他认为随着近年来欧洲人口中穆斯林的比重越来越大，欧洲未来将可能引发一场文化冲突。据他估计，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到2050年将有一半人口是穆斯林，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差异将导致欧洲内部发生冲突。

虽然海勒威指出了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他还没有切中要害的地方。实际上，人口增长的因素与欧洲的民主体制的结合，才是使欧洲人感到最可怕的。按照欧洲的民主体制，每个公民都有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欧洲穆斯林来说也不例外。那么，当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超过欧洲本土人口的时候，很有可能在多个欧洲国家选举出一个个穆斯林总统，欧洲社会将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十年二十年前有谁能想象，在美国会有黑人当选总统！很难说未来的欧洲不会出现祖籍是阿拉伯的穆斯林当选为欧洲国家的总统。

假如欧洲真的被穆斯林统治，假如这些欧洲的穆斯林再与阿拉伯本土的穆斯林里应外合，那欧洲人和欧洲将会怎样，这是不难想象的，但也是很难想象的。

欧洲人的“伊斯兰恐惧症”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欧拉伯(Eurabia)”，这个词由“欧洲”和“阿拉伯”两个词合成，意即“阿拉伯的欧洲”。如果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口都是穆斯林，欧洲自然就变成了阿拉伯人的欧洲，而不是欧洲人的欧洲了。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和美国会出现“伊斯兰恐惧症”。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魏子京： 海军世家走出的外交官

□ 关培凤

魏子京，1917年～1927年间担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积极维护和改善在澳华侨的利益，努力交涉中国赴澳留学生问题。1929年至1934年初出使秘鲁，先后担任过驻秘鲁使馆一等秘书兼代办使事和驻秘鲁全权公使，曾积极与秘鲁政府沟通，使其做出了不承认日本伪满政府的承诺，并为全力护侨而积极奔走。

海军世家出身

魏子京是福建闽侯人。出身于海军世家，父亲魏瀚是福州船政前学堂第一届学生，专攻造船，曾出任福州船政总工程师，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是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民国元年，魏瀚出任福州船政局局长。自魏瀚一代起，魏家四代海军，其中第一代共有九名魏家兄弟成为海军，毕业于船政学堂的共有六名；包括魏子京在内的魏家第二代共出了13名海军精英；之后的魏家第三代、第四代都出了一些海军军官。

魏子京是魏瀚的长子，1913年从福州船政前学堂毕业，此前因学业优秀，曾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四批出洋留学生，赴法国、比利时留学。魏子京不仅颇有语言天赋，英文、法文奇佳，而且处事机敏，善于周旋，这些优势使他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海军翻译官后，比较顺利地转入了外交界。1915年，北京政府任命魏子京为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负责主持云南对外交涉工作，由

此揭开了其外交生涯的序幕。

交涉修改澳国移民法

1917年8月23日，魏子京出任中华民国驻澳大利亚第五任总领事，1918年到任。由于近代以来华人在国外长期受到严重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护侨成了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担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的十余年中，为反抗澳洲“白澳至上”的种族歧视政策，扩大在澳华侨的利益，魏子京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动澳国修改移民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澳洲华人掀起了新的修改移民限制法运动。魏子京到任后，给予大力支持和合作。他接连向澳大利亚内阁提交备忘录，要求放宽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最终促使澳大利亚在1920年8月同意修改移民限制法中关于留学、经商和旅游的条款。新条款规定，此后赴澳的中国学生，不仅不受年龄和留学年数的限制，学业完成后，还可以在澳经商。但在留学期间，不准兼营其他事业；经营中澳海运贸易的中国商人领有中方护照的，可以携带妻子及16周岁以下的子女来澳，同来同归；中国来澳旅游者，持有中国护照，并经英国驻华领馆证明后，准其来澳旅游，一年为限。此次对移民限制法的修改，使留学生、商人和旅游者获得了有限的权力，是澳大利亚方面所做的最大一次让步。但魏子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诸如允许华人民居的家眷来澳团